

法治文化

05

LEGAL DAILY

2026年8月9日 星期日

主编/王宇

见习编辑/尹丽

美工/高岳

校对/魏巍

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扫码阅读本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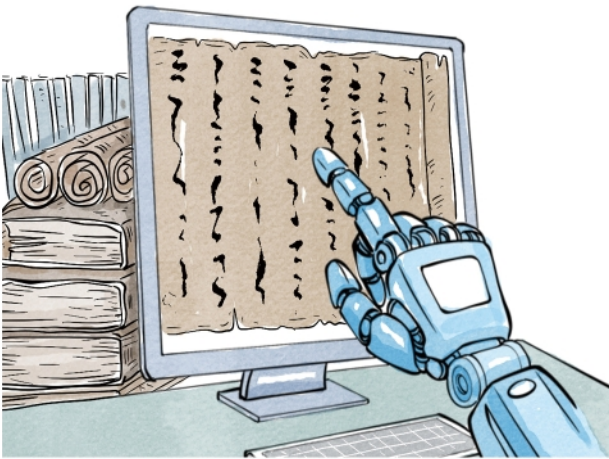


“共和国红色法源”展览馆于2020年9月建成并开放,位于红色圣地,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展览馆核心展厅近200平方米,馆藏各类文物史料400多件,由福建省司法厅和上杭县司法局共建。

“共和国红色法源”展览馆展示了闽西苏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领导苏区军民进行红色法制的伟大探索。从建立共和国第一套法制机构、第一套法律体系和第一套司法制度的一段历史,到最终形成我们今天选择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基因,这段探索历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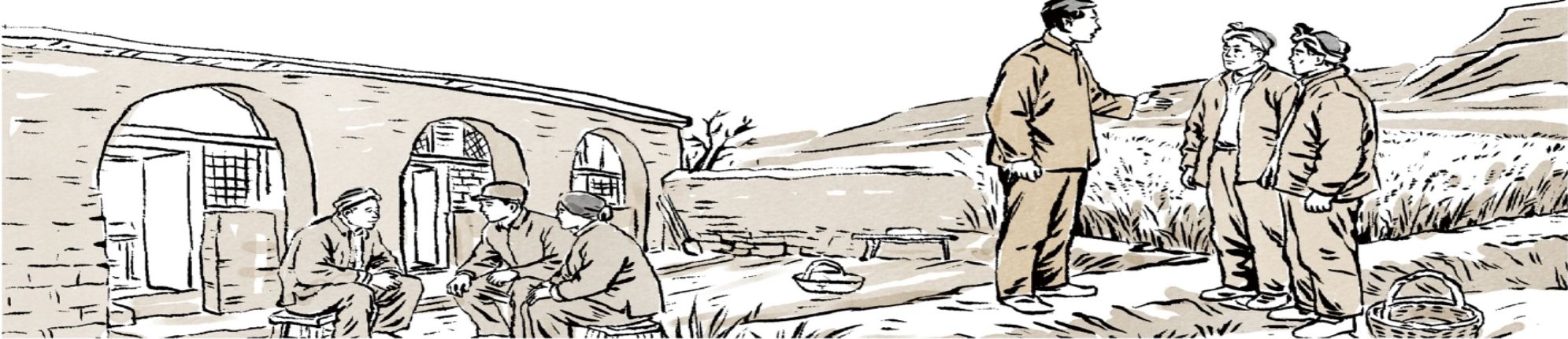
2020年,“共和国红色法源”展览馆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共和国红色法源”展览馆的建设对地方红色法治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共和国红色法源”展览馆陈列分为点燃星火、伟大探索、法治初心、传承发展4个部分,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文物史料,展现了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在法治建设上进行开创性的生动实践,尤其是在法治机构、法律体系、司法制度等多个方面的伟大探索。



“群众是一面镜子,谁是谁非都能照见”

——陕甘宁边区民间调解模范郭维德寻访记



□ 郑栋 李康嘉 吕浩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提起“郭维德”这个名字,依然会勾起人们的记忆。一个人为什么会被一群人铭记?或许,答案就藏在一个叫西直沟的村子里。

民间调解的模范村

从延安北上,行走在黄土高原腹地,沟壑梁峁,满眼绿意。穿过绥德县城向东,刚望见义合镇老街上的城楼,车就驶入了西直沟村。早晨六七点钟,这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郭维德,解得下(陕北方言,意为知道),”61岁的村民常大哥指向村口方向说,“他住的窑洞就在那儿。听老辈人讲,谁屋闹心都寻他。”

“郭维德,该是那位老革命?”正在拾掇红薯秧苗的村民霍大婶将锄头挂在田里,“镇上那座水泥桥,就是他帮着修下的。”

“郭维德就住这儿。”我们边打听边寻找,在一处矮坡上的院落里,村民郭海生笑呵呵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父母当年把院子租给老英雄一家居住。听老人讲,他当过游击队队长,看,那把石锁就是他练功用的。”

一个让群众知心的人,一个牵挂家乡的人,一个奋勇抗敌的人……笔者寻访的郭维德,似乎留下了许多印记。当翻开一张张曾经风行于陕北的报纸,这位陕甘宁边区的英雄模范,以越来越清晰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

距离西直沟村仅有5分钟车程的绥德县人民法院义合人民法庭,是展陈郭维德历史资料最集中的地方。二楼资料室的南墙上,一份出版于1944年5月8日的《解放日报》吸引了笔者的目光。在这张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刊登着一篇《西直沟为一年以来民事纠纷均在村内解决》的新闻报道,显著位置标注着一行字——民间调解的模范村。

“《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有很多关于郭维德化解矛盾的新闻报道。”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已经35个年头,绥德县延安精神研究会研究员刘水波对郭维德印象很深,“那时候,一张报纸由识字的人轮流读给群众听,郭维德的事迹很多人都听过。”

查阅延安时期的相关新闻报道,有一段记载令笔者深受触动——“在郭维德的积极努力下,西直沟村在两三年当中,没有人打过官司,村里甚至连争吵的事情都鲜少发生。”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伟,是关注郭维德的专家学者之一。“资料显示,郭维德1936年入党,1948年,他离开陕甘宁边区到甘肃工作,成长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可以找到我们党开展社会治理的实践源流与逻辑。”韩伟说。

韩伟告诉笔者,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任务很重。当土地租佃、婚姻家庭、物资征拨等方面出现纠纷时,很多人觉得调解误事,不愿“说和”。“在这种情形下,郭维德主动投身到矛盾纠纷化解中。他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自己利益受损失,把公心挺在前面理

非,顺曲直,躬身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用。”韩伟说。

“群众的力量像山水一样”

对于父亲的公心,年逾八旬的郭绣琴有着难以忘怀的回忆。这位出生于西直沟村的绥德女子,在甘肃平凉的一家国营工厂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了一辈子。

“爸爸是个热爱群众、公私分明的人。”郭绣琴说,“听妈妈讲,在绥德,他白天和乡亲们种地,晚上跟战士们巡逻,十里八乡的情况都熟悉。”

1942年,已经跟随组织做了7年革命工作的郭维德被群众推选为西直沟村主任。这一年,他只有24岁。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被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分区的绥德分区,一边承担起保卫边区北大门的任务,一边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中共绥德地委的领导下,1943年春,绥德的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据统计,当年,全区共增产细粮5175石,创造了粮食生产的好成绩,涌现了赵占魁、吴满有、刘玉厚等一批劳动英雄,郭维德就是其中一员。在1945年1月21日出版的《边区群众报》上,笔者找到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特等奖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民间调解模范郭维德”赫然在列。

“义合郭维德五天带领群众打水窖卅六个”“郭维德领着全乡打水坝二十五个,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群众运动”,在《群众日报》的字里行间,记录着这位劳动英雄的事迹。

劳动英雄是如何开展民间调解工作的呢?在1945年1月9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后来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地记者曾克,采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绥德义合王家坪村村民王怀音和谢永光两家是几辈的邻居,靠着一条山水灌溉田地,却为着一条路,争得不可开交。多次调解后,王怀音仍然坚持“一家修一家走”,受组织委托,郭维德赶到了王家坪。了解完情况,郭维德和村里商定,公开调解,动员群众发言评理。经过讨论,群众都觉得谢永光可以走王怀音修的路,可王怀音还是“瞪着眼睛扭着脖子”不改变主张。

“群众的力量像山水一样。”陷入胶着时,郭维德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一个人能挡住山水吗?”郭维德问。

面对群众,王怀音的态度松动了,答应回家再想想。当天晚上,郭维德又到访王怀音家,拉家常讲道理,最终王怀音改变了态度,双方重修旧好。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薛永毅长期从事延安时期政法工作研究。他告诉笔者,正是因为怀着为民造福的热忱和信念,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才得到了群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

“边区政府1944年9月颁布实行的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规定,劳动英雄由群众选举产生。”薛永毅说,“劳动英雄里的民间调解模范,见证着党心与民心的双向奔赴。”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1944年3月,《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报道了封芝琴婚姻案,并引起巨大轰动。毛泽东同志专门为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的展厅里,有两行字十分醒目:“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先调研再调解的工作方法到调解边区宣传教育的工作习惯,从动员群众评理说事到依靠群众灵活解决争议,郭维德开展民间调解工作的实践,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司法工作紧密结合的范例。

在《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中,笔者找到了一封发布于1944年6月7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这封信由时任边区议会会议议长谢觉哉代拟。也正是在这封指示信中,郭维德的调解工作经验得到了肯定,并在陕甘宁边区推广开来。

“各地要学习西直沟,学习郭维德,要号召劳动英雄,有信仰的老人和公正人士参加调解,会调解、调解有成绩的人,应受到政府的奖励和群众的尊敬,要选拔出调解英雄,因为他为人民做了好事。”指示信中这样写道。

温故而知新,笃行以致远。从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的指示信,到2023年绥德县人民法院“郭维德调解室”挂牌运行,79年过去了,黄土高原上已换了人间。

今天,一项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决策和系统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已迈出坚实步伐,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团卷正在扎实铺展。

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临近端午,在枫桥镇综治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矛盾纠纷的处置进度。“群众的诉求在这里可以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枫桥镇党委书记卢金凤说。

刚刚调解完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全国人民调解专家杨光照对笔者讲述了自己的心得。“化解矛盾纠纷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杨光照说,“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在陕西,平安建设正在与法治建设两翼齐振,向着更高水平推进。

2025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实施意见,推动调解组织入驻综治中心,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正在加快构建。

“要把黄土变成金”

“男女老少哟,一条心,要把黄土变成金,生产变工要合作,丰衣足食有把握”……

这是大生产运动中传唱在西直沟村的民谣。抗战胜利后,西直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呈现出人人早起,家家劳作,和睦愉快的面貌。

时光飞逝,岁月留痕。今天,红色革命沃土中滋养的“金钥匙”仍在闪光,民谣里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在郭维德出生的地方——绥德县满堂川镇,群众在“说事堂”里化解怨气,理顺心气,充盈正气。2023年11月,满堂川镇首创的《“说事堂”邻里解纷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名单并在榆林全市推广。绥德县人民法院“郭维德调解室”探索出“三听三问”工作法——听群众说难处、听乡邻评是非、听长辈讲理,问法律依据,问历史渊源,问化解可能。截

AI时代先秦儒家礼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观察

□ 谢桂山 王荣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算法的快速演进,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智能文书生成、大数据社会治理、虚拟沉浸式普法等数字化工具全面走进法治建设各环节,深刻重塑着法律运行、社会教化与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式。在此宏大背景下,植根于华夏文明深处、绵延数千年的先秦儒家礼法文化,迎来了极具张力的时代境遇。

先秦儒家礼法文化以礼润德,以法定分,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核心逻辑。其所倡导的“仁爱诚信”“德主刑辅”“和而不同”等理念,不仅是古代中国维系社会繁盛的纽带,还是现代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滋养。

当下,数字技术飞速迭代,传统礼法文化的传承模式与实践场景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AI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古籍保护、法治普及、道德教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载体;另一方面,技术发展自带的算法偏见、工具理性的膨胀以及古今价值体系的差异,容易造成传统礼法精神被简化、曲解,难以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因此,聚焦传统礼法文化的现代价值,立足普通群众、基层法治场景探讨礼法文化的数字化转化路径,通俗解读先秦礼法文化核心价值,并结合AI技术应用利弊,提出接地气、可落地的转化策略,助力传统法治文化走进大众,服务基层数字治理,亟待实现突破。

德法共治:先秦儒家礼法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

先秦儒家礼法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在推进数字法治建设的当下,重新审视其核心内涵,对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方法论与法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礼主法辅”的双层治理逻辑。先秦儒家所说的“礼”,并非单纯礼仪习俗,而是覆盖日常交往、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从婚嫁丧祭的民间礼仪,到待人处世的相处准则,“礼”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倡导尊重、包容、互助,依靠内在修养实现社会和谐。儒家语境下的“法”,并非现代独立法律体系,而是礼的兜底保障。儒家主张道德教化优先,法律惩戒后置,认为依靠教化引导群众自觉守规,远比单纯依靠严处罚更有利于长治久安,形成“礼以劝善、法以止恶”的治理思路。

三大贯穿古今的价值内核。一是以人为本。儒家礼法制度设计围绕“人”展开,重视个体品德培育、家庭和睦,追求和谐共生,与现代法治保障公民权益、人性化司法的理念高度契合。二是礼法相融。不割裂道德与法律,既避免法律冰冷僵化,也防止道德约束流于形式,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提供历史参照。三是中庸调和、反对极端化处置矛盾,主张结合实际灵活平衡各方诉求,这与基层调解、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内在逻辑相通。

礼法文化的时代局限。先秦礼法诞生于等级社会,包含尊卑有序观念,与现代社会平等的法治原则存在冲突。同时,传统礼法高度依赖人伦教化,缺乏标准化制度设计,难以直接适配数字化、规范化的现代治理体系,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成现代化改造。

双刃剑效应:AI时代礼法文化传承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在为传统礼法文化复兴插上技术翅膀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与社会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为礼法文化传承打开新空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数字化留存,守住礼法文化根脉。依托AI文字识别、古籍修复技术,散落在各类古籍中的礼法文献可以批量数字化存档,智能翻译、注释功能降低了古文阅读门槛,使普通民众也能轻松读懂传统法

治典籍。依托VR、3D建模打造线上数字展馆,直观复原古代礼仪、调解场景,让静态古籍变为可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礼器。

第二,全媒体传播,拓宽普法教化渠道。短视频、智能问答小程序可提炼儒家诚信、友善、无论等礼法理念,通过智能算法精准推送给不同群体,打破线下讲座、书本阅读的传播壁垒,实现随时随地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

第三,赋能现代法治实践,活化传统治理智慧。AI大数据可梳理民间纠纷规律,借鉴儒家“息讼止争”理念搭建线上调解平台。智能合同、信用系统融入传统诚信理念,将礼法精神转化为可落地的数字化治理工具。

AI时代礼法文化传承面临的三重难题。其一,算法简化造成文化失真与算法权力扩张风险。AI依靠关键词抓取解读古籍,容易割裂礼法文化完整逻辑,片面抽取条文,忽略背后人本、和谐的核心精神,造成大众对传统礼法的片面误解。若缺乏对算法权力的有效规制,传统文化的阐释权极易被冰冷的代码逻辑所扭曲。其二,工具理性冲淡人文底色,陷入“价值对齐”困境。人工智能侧重效率、量化评判,而儒家礼法重视人情、教化、柔性化解,二者价值取向存在冲突。过度依赖智能系统容易弱化司法、治理中的人文关怀,如何让AI真正吸收“仁爱”精神,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伦理的价值对齐,是当前的一大痛点。其三,数字鸿沟加剧认知差距。老年群体、乡村群众数字操作能力不足,难以接触线上礼法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反而拉大了城乡、代际间传统文化认知差距。

价值引领:先秦儒家礼法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推动礼法文化创造性转化,应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人文的价值对齐。

搭建智能数字平台,实现礼法文化轻量化普及。系统整合《论语》《周礼》等典籍,搭建简易智能数据库,简化专业术语,配套通俗解读、生活案例,开发轻

至今年6月底,50%以上的民事案件成功先行调解。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陕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真抓实干,更高水平平安陕西建设的成效,正在让更多的群众可感可及。

“多亏了综治中心,要不这麻烦事还不知啥时能到头哩。”7月28日中午,在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镇,聊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桩“小事”,居民宁刚笑着对笔者说。

农历三月三,宁刚骑着自行车到镇上赶集。在岔路口,骑摩托车的刘东驶了过来,宁刚躲闪不及,受了轻伤。因为赔偿问题谈不拢,两人闹起了矛盾。走访了解相关情况后,网格员刘小凤通过小程序“三秦解纷宝”将情况一键上报至镇综治中心。

收到线索后,上元观镇综治中心统筹司法所、镇村两级调委会成立调解小组,面对面讲清法理,一对一讲明事理,心贴心讲透情理。在调解小组的劝解下,宁刚和刘东之间的对立情绪逐渐消除。最终,他们在综治中心里握手言和。

在陕西,107个县级综治中心已全面建成运行,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正在全面深化。“十五五”开局之年,陕西各级党委政法委统筹推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和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履职,形成合力,“有矛盾纠纷找综治中心”已经成为三秦百姓的共识。安康市在综治中心全面推广“无忧调解超市”工作模式,谁来调解群众说了算;宝鸡市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力求“不上楼、不进院、不拐弯”,群众咋方便中心就咋建;延安市把调解服务送上门,群众“点单”干部“接单”……

辛勤耕耘在矛盾纠纷排化化解一线的还有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截至目前,陕西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23万个,省、市、县三级调解协会实现全覆盖,调处成功率98%以上。

2025年,在陕西省政法委会的统筹调度下,5位优秀人民调解员站上讲台,面向全省网格员分享工作经验和体会。

“群众是一面镜子,谁是谁非都能照见。”寻访中,郭维德常讲的这句话不时跳入我们的眼帘,叩击我们的心灵。

郭维德的事迹或许并没有惊天动地,却得到了群众的公认,赢得了人们的口碑。今天,我们依然能从这位奉人民群众为明镜的民间调解模范身上,感悟崇高且朴素的信念,望见坚定且赤诚的理想。

1976年,罹患重病的郭维德最后一次回到绥德。在弟弟郭维金家里,他关切询问着西直沟村得了多少粮,镇上修的水泥桥结不结实,群众家里还有啥困难要解决。在他心中,人民群众这面镜子永远举得高高的,端得正正的。

1977年7月,郭维德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59岁。他生前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举行了追悼会。郭绣琴老人回忆,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中,绝大多数是自己 and 家人,都不认识的群众。

郭维德长眠在西直沟村北面的一座小山上。49年过去了,风沙已渐渐远去,绿意正在蔓延,绿树掩映中,一方墓碑向着南方静静伫立。

绥德向南是延安,那是郭维德魂牵梦绕的地方。

漫画/高岳